

中日知识界交流实录

——冈千仞与上海书院士子的《笔话》

易惠莉

(华东师范大学 历史系, 上海 200062)

摘要: 中日两国同文, 因此自古以来两国文人相遇, 在思想沟通、文化交流等方面不存在多大障碍。因为虽然语言不通, 但是可以通过笔谈的方式来进行交流。在日本的各种资料, 尤其是近代以来的公、私资料中, 保留有许多日本文人与中国文人笔谈的记录。这些笔谈记录不但成为今天我们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中日关系史等的珍贵资料, 也成为研究、分析晚清士人思想文化及精神生活的重要资料。本文主要依据 1884 年日本汉学家冈千仞在上海与龙门书院出身的一批士人的笔谈, 考察新一代口岸知识分子的思想、文化、政治及精神状况。

关键词: 冈千仞; 王韬; 笔谈

中图分类号: k256

文献标识码:

中日两国同文, 因此自古以来两国文人相遇, 在思想沟通、文化交流等方面不存在多大障碍。因为虽然语言不通, 但是可以通过笔谈的方式来进行交流。在日本的各种资料, 尤其是近代以来的公、私资料中, 保留有许多日本文人与中国文人笔谈的记录。这些笔谈记录成为今天我们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中日关系史等的珍贵资料。本文介绍的冈千仞 1884 年访华时与上海文人的笔谈记录即属此类。¹

明治维新令日本实行了长达二百年左右的锁国制度就此终止, 因而 1868 年后以不同背景来华的日本人甚多, 其中有颇多汉学造诣深厚的汉学家留下了内容丰富的汉文日记体访华游记。日本研究者关于这批访华游记有如下评述:

“明治年间, 我邦汉学界之耆宿、而游中国留下有名之游记者有三人。一是《栈云峡雨日记》之作者竹添井井, 二是《观光纪游》之作者冈鹿门, 三是《燕山楚水纪游》之作者山本梅厓。不过《观光纪游》和《燕山楚水纪游》均有感愤于时势、时发策论之痕迹, 而《栈云峡雨日记》则其游与其人相俟, 所到之处俯仰感慨, 境之奇与文之奇相照, 是书乃盛行于一代。”²

该评述格外推崇竹添光鸿的《栈云峡雨日记》是出于单纯文学价值的评判。若换以史学价值的评判, 则冈千仞《观光纪游》和山本宪《燕山楚水纪游》的“感愤于时势”,³就可成为受到重视的理由。另外, 还可以从著述者的年龄的角度探讨这三部游纪的史学价值问题。竹添光鸿和冈千仞均是长成于江户幕末时期、在明治时期被称作为“天保老人”的汉学者, 而山本宪则基本属于出生在幕末而长成于明治时期的所谓“明治青年”。⁴属于“天保老人”一代的日本汉学者, 他们的对华观在 1870—1880 年代处在一微妙变化的阶段, 《栈云峡雨日记》和《观光纪游》正是完成于这样的背景下。至于作为“明治青年”的山本宪, 他的对华观的演变则缺少“天保老人”一代汉学者的微妙性, 更何况《燕山楚水纪游》写作于日本社会的对华观已趋定型的 19 世纪末。因此, 同属“感愤于时势”的游记作品《观光纪游》和《燕山楚水纪游》, 前者的写作有更多对中国同情理解的立场,⁵其记述的客观性及反映历史时代的丰富性和深刻性都使其史学的价值格外突出。

《观光纪游》的作者冈千仞(1832—1914)出身于仙台藩的大藩士之家, 青年入江户幕府官学昌平黉, 幕末他不但作为一名后起的汉学者活跃于日本文坛, 而且也是一名参与维新

运动的倒幕志士，明治时期作为一名著名的汉学家他一度在政府修史局任职，并出任东京书籍馆馆长，但在西南战争后政府精简人员的背景下，他于1880年前后脱离公职，开始了以著述及私授学生为生的晚年生涯。冈千仞1884年5月来华游历，在近一年的时间里，他的行迹遍南方以苏、沪、杭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以北方京、津、保定之间的华北大地，以及华南的广州、香港等地。游历中冈千仞与上海生活在华洋界中的民间文人、新闻业的从业者、年轻士子，与苏、浙两省的学者、乡绅，与京津两地的官员士夫都有深入的交流。在《观光纪游》中留下名姓的中国文人达一百数十人，其中有李鸿章、盛宣怀、俞樾、李鸿裔、文廷式、李慈铭、王韬、张焕纶、李平书等中国近代政界、文化界的名人。关于冈千仞此次访华史料除了集中于《观光纪游》一书外，其他还散见在冈千仞个人的档案资料、盛宣怀档案资料以及《申报》等中。⁶这些史料多已为国内研究者所见，本文仅介绍散见于1884年日本《邮便报知新闻》的有关部分。

《邮便报知新闻》是由报知社所办的一份日文日报，设《文苑雅赏》专栏刊载日本汉学家汉文诗文作品，注重在有汉文学修养并留恋汉文学传统的社会群体中吸引读者。报知社曾在1879年发起邀请王韬访日，王韬《扶桑游记》的版权也因此归该社所有。冈千仞1884年5月29日由东京起程，6月19日《邮便报知新闻》以《上海近况》为题刊出冈千仞自上海寄回的见闻报道集萃，并配发了以报知社社长藤田茂吉署名的按语。按语全文如下：

“冈千仞先生将游清国，同人祖筵于八百松楼，余亦列其席。尔时，余谓先生曰：‘往年王紫诠游东京作我社宾，先生与生等与其数度往来，今先生西游，王氏必作东道主人。以先生之翰墨加此壮游，有王氏之周旋而探奇访胜，必有惊世之文辞，望先生收之筐底，归来之后割爱出之以示世人，以先生之意传之于世，而我以报纸助其事。’先生笑曰：‘记事务欲公诸于世，何敢秘之。’乃与先生相约，尔后待其报。先生今践前约，赠寄《支那漫游日记》（汉文），又择其报告者报之外况。余不胜欣喜，立刻揭于报纸，以示同人及世之人，并以先生之游记刊于《文苑雅赏》，读者谅之。”⁷

冈千仞寄回的沪上见闻集萃在19、20日分两次刊完。6月20日《文苑雅赏》第一次刊出冈千仞《支那漫游日记》（6月6日——6月8日），7月1日续刊（10日——14日）。⁸7月5日刊出冈千仞与上海文人的唱和诗作，7月9日、10日、11日《文苑雅赏》又以《笔话》为题分三次刊出冈千仞与上海龙门书院士子的笔谈录。《邮便报知新闻》为刊登《笔话》配发按语如下：

“左笔话一篇，系鹿门冈先生在上海与彼士人孙照、⁹姚文枬、¹⁰葛士濬、¹¹范本礼、¹²张焕纶等相语者。¹³主客六人笔往笔来，或甲问而未及，乙答之；丙又发一问，或均是乙答也。一人既言，一人不足之，复注添其字旁。错综互见，涂鸭不一。加以原稿纸数十张，贴缀略无序次，写手甚苦其不了了。因明按语势、寻字样，别人属辞，连接整顿；可识其人者，各冠姓每语头；不可识者，代以白圈厥疑；间语之无关系徒碍心目者，割爱删去，务谋便看阅。编者僭妄，得罪笔者多矣。文中若有似疵类者，乃皆编者之过也，读者谅焉可。”

以下是《邮便报知新闻》所刊载《笔话》全文。

二

冈：拜承高名，钦慕有日。幸赐临访，太太谢谢。

0：客岁拜读大著《尊攘纪事》，¹⁴钦仰之至。昨得姚君子梁书，¹⁵知台旌莅沪，得蒙识荆，不胜欣幸。

冈：弟岛域贱人，固于述作大旨朦然，□稊电览，惭慙悚悚。

0：台旌来沪，定须徘徊多日，可以随时赐教。

冈：弟与杨公星晤先生同船而来，船中约同游苏湖、访诸名士，而杨公行李山堆，料理之颇费日子，故未刻发期。¹⁶

0：敝友南汇于君澧尊，奇士也，居周浦镇，去沪约三十余里。先生愿见之否？

冈：弟一昨日来此，未出沪寸步，未见于君，不知于君业何事？

0：于君系南汇邑附生，经学书画无不讲究。姚君子梁所著《日本兵要》一书渠曾为作序，盖于本姚君旧友也。¹⁷

冈：诸君辱赐高临，何以答高意？敢问诸君，皆寓龙门书院？

姚：弟与葛君在龙门，张、范、孙三君皆在正蒙书院，与龙门相距尚近。

冈：二院皆在城中乎？敢问所业何科目？

姚：龙门所课经史词章杂学，各随所近，而以讲明法理为主。正蒙书院即张君所创，教法甚善，其详请询之张君。

冈：鲍花潭先生之事，¹⁸因子梁先生而耳其高风，不知可得进谒否？

姚：鲍师已回江北去，须秋到沪，届时恐台旌已发耳。

冈：弟此游，以定[上]海为根据之地，南船北马，虽前未定踪迹，往还皆不得不由是处，他日得便必见先生。

姚：鲍师虚怀若谷，硕学如先生无不愿见者。然沪上为便耳。

冈：待先生来此之日，请谒。敢请为弟介绍。

张：昨接子樑先生信，悉先生莅沪，特来展谒，并领雅教。前见《冲绳志》有先生序文，曾捧读一过，钦佩之至。又闻先生著有米（美）、法二史及《尊攘纪事》，可否赐观？

冈：弟诸著无一发明，徒传丑天下者。唯著书本将为人也，上刻本将示众也。故此游捆载各种诸书，将就正大方君子也。唯诸君一见，必笑为辽东豕类也。

姚：屡得家兄书，稔著撰等身，幸得承教。未识可就座赐观否？

冈：曾于长兄公所拜观先生试卷，敬服甚。今日得接光范，真文字因缘者！

姚：浅学一得，滥承过赏，良自愧尔，愿有以教之耳。

冈：后拜观梅影七律五首，陋邦能作者感叹和韵，诗一时传播。弟亦欲追和，恐来狗续之讥，遂不赋。¹⁹

姚：此诗是十年前作，初学韵语，本不足供大雅一哂，乃无意传播。得邀贵邦诸君赐和，抛砖引玉，斯之谓矣。

冈：诸子追和者，暨皆弟之社友，尔时皆无不苦吟搁笔。此挂十年前之高作，愈不胜敬服者。

姚：先生著撰极富，弟所曾得捧诵者，惟《尊攘纪事》一种，已不胜钦佩。其余有携在行篋者，可即坐次赐观，以慰饥渴否？

冈：弟于此著沥尽心血者，今得大雅之推称，真有知音之感。此书遗漏极多，后更补逸遗，草四卷，黎正棧赐序，发前刻成，赍来在此，今供高览。²⁰

弟与子梁君至亲，子梁君亦嘉弟老实无他，频频往来，常曰：吾来日东得忘形知己，君之在日东实无亲如仆者。诸公皆因姚君而得见者，伏请无所外视，赐明教！

0：紫诠先生自谓日东诗祖，先生许之否？

冈：往年一见《普法战记》，推服不置。先生之东游，实弟等之所聘致。先生妙于诗文，敏捷实为无前，而猖狂自肆，自弃于绳墨之外、礼仪之表，甚似晋宋间之人。先生以为如何？

0：此人乏里闾之誉，即以猖狂自肆之故。

冈：想先生不得志于当世，徒以林下纵饮泄郁郁不平乎？来此闻先生吃毒烟，如此贵重性命，亦不甚惜乎？

0：今人之吃鸦片烟，亦往往由放废无聊，而借此以资排遣，初不问性命之贵重与否也。

冈：在他人犹不可解，以王先生之特达明敏犹为之，烟毒之误人一至此，仆始闻之，愕然！

0：惟聪明人最吃烟。

0：东国禁烟之令旧日颇严，未知今日禁令尚能遵行否？²¹

冈：沪上繁盛真为可惊，闻欧美人称此地形胜，为东洋第一之良港，果然。总城内外，凡有几万户？

0：不知细数，约有十万户。（一人自旁注云）更多。

冈：知倪鸿先生乎？²²弟前夕见此入于紫诠翁之座，才锋无前，实为才人，而乏于里闾之誉，何故？

0：近来文人约有数蔽。蔽于词章，则浮而不实；蔽于考据，则拙而不化；蔽于理学，则迂而不通；至蔽于声气货利，民斯为下矣，举国若狂。见识如是，毁誉亦如是，惟奇特之士，乃不为毁誉所动，亦能不以毁誉观人耳。狂生之谈，先生以为然否？

冈：如蔽邦更有一弊。洋学盛行以来，年少辈公然排老成耆宿为迂腐无用，自弃于绳墨礼义之表，谓世界万国唯有英、佛（法）文明可师耳，殆泛泛焉流漂鬼国者。阁下若不信，问之子梁君，真可憎者！

0：蔽邦亦然。其无识者至奉英米（美）人若神明，其好古正直之人，尤过鄙泰西人，至不屑道其事，不欲见其书。总之，喜谈洋务者其人都不可恃，而正士又若不知洋务，所以近来交涉之事终无好处。想贵国或亦同此情乎？

冈：有一利有一害，凡物皆然。况洋人巧艺技术，至踰千万里而逼我，直使五洲万国立下风，其奔波东洋至此，抑亦有故也！然彼至此，皆由谨品行重礼义，专用力于格致有用之学，与此间年少辈信洋学者有天渊之异。此不可不知者！

张：自欧洲人航海东来，我全亚洲人受其凌侮，目前惟贵国及敝国岌岌与之相持耳。然但有旦夕之谋，无百年之策。先生读书有识，有何高见可以赐教否？

冈：题目大甚，不可容易置对。

张：何妨大题小做。

冈：此事不可小做。

张：终赐教。

冈：紫诠先生尝论此事，一言而尽，仆常服之，曰：在自强而已。

张：目前未尝不讲自强，而求强得弱。仆以为未尝以实处求之故耳。然否？

冈：自强极是一大难事，迨天未阴雨，绸缪牖户，人人所知而泛泛然，唯偷安目前之事，此皆等闲于实处着手者。

0：今日洋学固不可不讲，然所以讲之者，欲知彼之情形，师其技而知其短可也。若一味崇慕，则直为彼之应声虫耳，何是言洋学？西人之所以制胜，其大要在实事求是。今之学西人者，事事欲学之，而独不学其实事求是。此所以日求强而日弱也。

冈：凡立国有固有本色，而信洋学者一意奉承彼，不知有彼此内外之别，此殆贱家鸡而贵邻骛。实意[事]求是四字，极断得至当。

0：贱家鸡而贵邻骛固不可，然必固拒深闭，谓人之长者不必学，恐亦非也。况今西人情形，与书、传所纪大不同。凡一切交涉之事、攻守之法，似尤当讲求。

冈：弟在国数论不必使人人讲洋学，唯洋书切实于家国者，（如分晰、格致、天文、地理、航海、造船、矿山诸学）一一使能文者延洋师舌人翻译，为人人可解之书，施之国内学校，致圣经贤传并讲。如此则人人知彼长处、我短处，无差谬如今日者。阁下以为如何？

0：所论极是！然翻译亦大不易事。

冈：北京置同文馆想亦此。近来有何新译书？

0：同文馆译书不甚多。上海制造局则有书目，惟人人可解之本殊不多。

张：先生能泰西语言文字否？

冈：弟迂腐不涉西学，中年颇然沁于此学，非复老大人所能学得，此为憾耳。²³

张：见大著上有所称唐太者，即是桦太岛否？此岛现属俄抑仍属贵国？虾夷岛自设北海道后，建设几县？札幌是县厅否？此城之外有箱馆，是否县厅？此外别有县否？乞明教！

冈：虾夷全岛旧名，今置北海道，唐太、桦太邦音同，为北海道极北嶋屿，直隔海峡与黑龙江相对。

张：贵国自维新后，列藩已不得私有其土，尚存其空名否？

冈：赐旧封土十分一为家禄，别置华族，世袭爵位，列士民之上。

张：北海道旧国有几？西亮府即西京否？

冈：西京在东京更西千余里，北海道在东京东北三千里，此在[与]中华满州同纬度。此地极寒孤岛，非人理所胜，故多付莽苍。

0：东国废藩封后，改为三府六十县，后归并为三十二县，不知何时又添置为四十一县？添设之县除冲绳县外，余五县其名若何？且属何府何道也？

冈：八百年前王制行国内，时分为五畿七道六十六国，大权落武门，此制灭裂，为封建，为割据。至德川氏仿周家五等爵，置大小三百藩，郁郁文治颇为可观。此后经霜已久，文恬武熙，加之外国事起，大藩唱异论，皇上赫怒，遂致戊辰之中兴，此后沿革不一。今方为三十六县，县犹州也，唯以东西京、大阪为全国首府，别为三府。

0：贵国县郡沿革，有详明之本否？贵国輿图以何本为最准？

冈：封建世袭，各秘封土租额，幅员广狭，不敢公称，真孟子所谓诸侯各削其籍者。明治以来此陋一变，方置编辑局于各县编地志，未成輿图有坊间许多本，唯得大略耳，未正确。

0：学问之道，议论、考据二家何者为要？贵国文士于二者，孰为讲明切实？

冈：仆固将以是事，质大方诸君子，何得当高问！唯以私见，考据一事先贤搜索无不至，今也以可惜之日月，兀兀白头于此，似无用。阁下以为如何？

0：鄙意古地不必屑屑搜讨，今地则必须考校切实。

冈：如地理，要一一实地探讨，不得不考校切实者！

0：新国史略一书，行篋中有否此书？尊意以为何如？

冈：仆不知此书，想坊间射利之书，陋邦此类夥多。

0：近藤圭原著此书。

0：贵国有中村正直号敬字者，其人尚在否？²⁴

冈：此人为弟旧友，今为大学教官，开塾授洋学，生徒充满。

0：前曾见此君之文，颇服其识度超远。先生在贵国为何官？

冈：弟不为官，故得汗漫举此海外之游。

0：前读《〈冲绳志〉序》文，不胜钦佩。昨得姚君子梁函，知先生著作甚富，可否一一赐拜？《冲绳志》来此间否？²⁵

0：子梁兄寄来的。

0：《尊攘纪事》一书，客秋由子梁兄寄示，嘱送沪报馆分日排印。弟已交李坪书兄带去。²⁶倘行篋多带几部，祈见惠一部，尤感！补遗二册，可否一并赐读？

冈：此游带各种数十部来，纵无商请，固将呈一部聊表稿纒之意。此著至付沪报传播邇尔可泚面者，唯诸公推重至此。真佩服有余者。

书劒飘然海外游，沪滨小驻识荆州。

中原河狱凭君览，能助龙门史笔不？

口占奉赠

鹿门先生 雅政

弟焕纶呈稿

冈：不敢当！不敢当！弟因此事有创见，马迁唯游四方，故能记四方之事，无一遗漏，遂成不朽之书。夫子游列国，故能闻见列国之事，成春秋不刊之书。今著书者仰屋终年，足不出闾里，此辈能穷万卷、涉五车，神气不副，非抄古书则是陋见者，宜其书陈腐，真气索然，无一足动人者。先生以为如何？

张：高论甚是。鄙人谈之，殊觉惭愧耳！今日为时已久，先生亦太劳矣。仆等谨辞别，改日领教。

冈：弟此游非漫然放浪于山水，将交诸名士，磨琬学问人物，所谓到处与贤豪长者交是也。伏请不鄙弃岛域之一穷措大，收列下交之末，赐源源来往，何幸尚之！弟客居无一事，唯见诸名士为公务，请谅此诚。

张：仆等今日得闻雅教，实为至幸。此时天已晚，又下雨，不得不告别矣，容他日再请教。

冈：《大清一统志》寻常书肆皆贩否？

张：大书肆及专卖旧书肆必有之。

三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逐渐走出只能在传统文化情趣意义上达到共鸣的陈旧状态，有一相当漫长的过程。要理解甲午战后中日文化交流全新局面的出现，则 1870—1880 年代这一领域发生的演变是探究其发生原由的重要线索。这也是 1884 年冈千仞访华及其留下的所有文字资料的史学价值的一个方面。冈千仞访华前十年间，中日两国关系经历了日本侵犯台湾、吞并琉球，以及朝鲜壬午兵变等事件，两国关系日趋紧张，民间媒体中两国互不信任的言论亦渐见激烈，尤其在 1879 年琉球事件后。尽管有如此背景，由于新一代文人——在中国方面即是《笔话》中的一批书院士子——仍然为中日文化交流带来了新的气象，这是读上述《笔话》首先获得的感想。《笔话》内容丰富，从一般文事话题到国家政治问题，表现了交流双方对对方国家的关注。至于话题所涉深度或尖锐的程度，尤其是中国文人对日本事务的广泛兴趣，在同时期其他史料中难得一见。正因此这份《笔话》作为史料的价值，并不只局限在反映中日文化交流的意义上，还在它反映口岸城市上海文人群体思想文化状况的意义上。本文以下部分，以《观光纪游》的记录解析《笔话》内容，全面寻迹 1884 年冈千仞与书院士子交往活动，再现中国近代社会变迁历史图卷中一段独具意义的画面。

对照《观光纪游》，《笔话》是冈千仞与上海龙门书院士子两次笔谈的记录，第一次在 6 月 9 日，即冈千仞抵沪后的第三日，第二次在 6 月 15 日。在此将《观光纪游》中有关这两次笔谈的背景资料清理出来。其一，6 月 9 日双方首次会面：

“张经甫（焕纶）、葛子源（士濬）、范蠡泉（本礼）、姚子让（文枏）来访，谈及洋烟流毒中土。余曰：‘闻紫沔亦近吃洋烟’，子源曰：‘洋烟盛行，或由愤世之士借烟排一切无聊，非特误庸愚小民，聪明士人亦往往攫其毒’。”

其二，6 月 15 日冈千仞应张焕纶邀赴正蒙书院，这是笔谈双方第二次会面：

“……张经甫遣价来迎。经甫忧蒙养无法，设书院待来学者，生徒百余名彬彬向学。学舍新筑，楼上舍生徒，楼下为讲堂，严立学规，率之以躬行。葛、姚、范三氏来会，历问东土风俗政体及海外大势。已而延别室供点心。二宫姓及濯追踵，环座拥卓，各手一枝笔，畅谈终日。雨至经甫命轿送还，辞之不可。”²⁷

冈千仞自王韬 1879 年访日便与其建立起经常性的联系，他 1884 年访华于 6 月 6 日抵沪，在最初的三天内接触的全是活动在王韬周围的沪上文人士，其中不乏《申报》主笔人以及诗、书、画界的名流，但未有令他感到兴奋的深入交流。6 月 8 日，久居上海的岸田吟香向冈千仞告知王韬吸食鸦片之事，同时还以鄙薄的态度评价了日本汉学者熟悉的中国文人钱恽。²⁸ 不过，当日岸田吟香也向冈千仞介绍了上海的新动向：“中人渐用心东洋大势，《东瀛诗选》、《朝鲜

志略》、《安南国志》等书盛售”。就在这样的背景下，6月9日冈千仞开始接触到上海另一群体的文人，即以张焕纶为首的书院士子，《笔话》中冈千仞向士子们询及王韬、倪鸿的看法大约即在该日。²⁹12日，冈千仞赴王韬宴请，见“室奥陈阿片烟具，两客连床卧吃”，他发出感叹：“紫诠以一方名流犹为之”，^[1]对王韬失望之感想愈益加强。但在15日，在正蒙书院与书院士子的交流中，冈千仞则切实地感受到岸田吟香所介绍的上海的新动向，由此而受到鼓舞。这是他将两次笔谈的原件匆匆寄回国内发表的原由。冈千仞对以张焕纶为首的书院士子的好感，也直接反映在下述他17日应邀访问龙门书院后的观感：

“抵龙门书院，葛、姚二氏出迎。书院本李氏家园，应敏斋（宝时）为道台时买为书院，以待四方士子。有泉石之胜，竹树萧洒，亭台雅洁，略似我邦禅刹。堂壁录朱子白鹿洞揭辞，其设科一以经史宋学为主。延一间室供点心，赠刘融斋（熙载）著书六种，敏斋创书院聘致融斋督学政。弟徒慕德祠于学。”³⁰

冈千仞访华交往的中国文人，上海龙门书院士子是一个独特的文人群体。为了了解这样一个文人群体出现在中国、尤其是上海近代化进程中的意义和背景，必须提及龙门书院的创办。同治三年（1864）六月湘军攻克南京，曾国藩即督命修葺贡院，奏请于当年十一月举行江南乡试。1865年前后，上海道丁日昌一面大力整饬社会风习，一面“谕董修文庙”，议“创设龙门书院”。由是“沪城绅士倡议捐资，就上海城南也是园中添设龙门书院一所”。继任上海道应宝时也于规复传统秩序不遗余力，在龙门书院1867年迁入新址完成建校后，确立规制，使其成为在“苏松太三属举贡生童”中“甄取高材住院肄业”、“每人月给薪水银四两”的地方最高学府。³¹

在内忧外患的冲击下，晚清地方社会秩序无可挽回地渐趋崩溃，但受清政府平定内乱胜利的鼓舞，同治中期在江南地方曾一度形成对规复旧有秩序的信心，从政府到民间都致力于发掘传统社会文化资源中的积极成分，借以实现社会秩序的规复。³²口岸城市的上海也是如此，在应宝时关于龙门书院办学思想的阐述中，就可以读到这样的信念，即完全可以在传统中发掘出规复旧有社会秩序所需的文化的、道德的资源。所谓：

“……朱子教人主敬涵养以立其本，读书穷理以致其知，身体力行以践其实，学者推此而喜怒哀乐求中节，视听言动求合礼，子臣弟友求尽分，孰非学所兼综条贯者乎。……书朱子白鹿洞规于堂，俾日见之以资警省。月课性理、策论，期有合于胡安定经义治事立斋之意，故不以举业、诗赋列入课程。有志之士自亦不欲以遇合之心，夺其学问之实也。”³³

张焕纶、姚文枬等先后在龙门书院肄业的士子，多出生在太平军初兴的动荡年代，“同治中兴”——江南力图规复社会秩序之际，恰是他们的青年时代。无论书院重建的社会气氛，还是应宝时关于龙门书院办学思想的阐述，从中都可以感受到那是一个对于年轻士子相对有希望和进取的时期。良好的家庭背景，以及作为龙门书院的肄业生，这些年轻士子不但在学业上得到良好的训练培养，品行方面同样接受了严格传统的训导。³⁴书院士子以正统自居，这是他们在冈千仞面前公开对王韬诸人有所鄙薄的理由，也是他们日后成为社会精英的重要基础，他们是当时上海、乃至中国相对有希望的一批文人。对比冈千仞与王韬等人以及在中国其他地区与当地文人名士的交流状况，³⁵冈千仞与上海书院士子的交流相对更蕴涵有时代进步的意义。关于这方面，值得指出《笔话》相当的篇幅涉及中日关系的敏感问题，即琉球事件和“兴亚论”。这是上海士子在对外交流中有某种程度的积极进取精神的表现，此后双方的交流在这一方向上的深化则更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中难得一见的例子。

冈千仞游历江浙的行程因“马尾兵败”的时局变化而中断，他在匆匆回沪的次日即主动前往正蒙书院，与张焕纶、姚文枬、葛士濬诸人“慷慨论法事”。聚会中曾出现如下颇值玩味的场景，见《观光纪游》8月21日记载：

“……架上有姚子梁《琉球志》，经甫序卷首，痛摈我县琉球之为无名。余曰：‘往

时英法二国隔一海峡，百战争雌雄，淬砺锐锋。世以其战亘百年，曰百年之役，二国之强，雄视欧土，实由是战也。我东洋各国各锁四疆，其与隔海邻国接锋，有蒙古寇我邦，我邦伐朝鲜二役而已。其兵威不振，速欧米（美）之侮，实有故也。而中土一旦以我邦县琉球之故，大举问罪，则我邦虽弱小，独立东海二千年，势不得不一战。一战而败，则再战，再战而败，则三战，不以千败百挫少屈其锐锋，决雌雄于百战之后。如英法百年之役，则中日大舰巨炮、猛将健卒，视大海如平地，于是两国解怨讲和、协心戮力，西其锋，则欧米各国无一足惧者。此可以雪东洋积年之辱也。仆林下人，不知县琉球之何故，惟一目东洋威武震欧土则足矣。’众皆大笑。”^[2] (p102)

6月的笔谈中双方在琉球问题上隐而未露的矛盾，在该日有如此的表现，这在冈千仞实有“马尾兵败”时局激变的因素。面对冈千仞以社会进化论为立场阐发的“兴亚论”，书院士子们以“大笑”的暧昧态度处之，很难说其间的是非曲直，但有这样直入中日矛盾实质性问题的交流场景的出现也是一种进步。书院士子们对冈千仞的立场不置可否，不过8月29日士子们访冈千仞继续同一话题，而且以冈千仞为介，8月31日张焕纶诸人参观停泊在黄浦江上的日本军舰。^[2] (p109)

1884年间书院士子们在“兴亚论”问题上的真实立场，还得从李平书1884年2月在《字林沪报》发表的《兴亚策》四篇说起。^[3]自1880年以汉学者为中坚的日本“兴亚会”组织成立后，《循环日报》、《申报》以不信任、或轻视的立场回应日本“兴亚论”主张的文字甚多，其背景即是1879年的琉球事件。李平书1884年倡“兴亚论”，提出中日必须就琉球争端作一了断，以便应对西方在亚洲扩张新局面的见解。他说：

“方今大势，俄伺于东北，法雄于西南，若将钳制亚洲，且此后之蹈瑕抵隙而来者，奚仅此二国？而我克以竭力抵御者，中国而外厥惟日本。……然则居今日而策亚洲，至急之图端在琉球一事矣。诚使中日两国皆顾亚洲大局，各量其力之所不逮，息内讧之私，筹所以御外侮。能如昔日美总统之议，划分海岛分隶两国，永息争端，是为两全之策。否则中国直以大度出之，明让琉球使归日本，以敦交谊而释前嫌，从此开诚布公，共谋兴亚之策。”³⁶

1879年清政府在拒绝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划分海岛分隶两国”的调停方案的同时，无所作为并无限期地搁置中日琉球争端，使琉球问题成为中日关系正常化的障碍。李平书了断琉球争端的主张并未无视日本潜在的东亚扩张趋向，但他认为就眼下国际局势而言，“以俄法与日本较，其患之浅深缓急，亦不烦言而辩”，而且遏止日本东亚扩张的可能完全取决于中国的自强。他指出：

“日人之所以不满者，以未见中国自强之效也。夫使中国而立图整顿，政治日美，兵甲日精，则日人方将倾心之不暇，缔交之不遑，安敢萌其贪念乎？若使中国因循苟且，粉饰锢蔽之习积不能除，则日人窥伺其旁，今日而让琉球，固不免他日生心，即今日不让琉球，亦难保他日之不生心也。所以然者，国以自强为本，结援于人，不过因势利导之策，而不可徒恃乎。”^[4]

总之在中法战争即将爆发的背景下，李平书的《兴亚策》中不乏务实而有积极意义的内容。1884年上海书院士子主动积极地与冈千仞交流应与这样的对日观点有关。似乎有多种原因致李平书1884年末与冈千仞会面，³⁷双方的书面交流也迟至冈千仞游历京津回到上海后才发生。见《观光纪游》12月14日记载：

“李锺钰寄示《兴亚策》五篇，谓方今策不如付琉球于日本，与之协力以当欧米。乃论五策所未尽附其后，且曰：‘仆闻韩地之变，通宵不寐，窃以为琉球末界微事，今也中土受强敌，今复生事韩地，非特蔽邦之失，抑亦非中土之计也。中土将兴富强之治，与欧米角逐于瀛海之外，而安南如彼，朝鲜仅免危亡，四邻同文国稍有气力者，有一蔽邦而已。蔽邦于中土隋唐以来，传文学通贸易一千年于此，其为唇齿辅车之势，固不待

知者而知也。若中土积区区之微嫌，目敝邦为有异图，责以匪衷之语，则东洋之多事源于此，传不言乎铤而趋险不可不戒焉’。”^{[2] (P224-225)}

值得指出此次交流发生的背景。12月4日朝鲜汉城发生“甲申事变”，迟至12月13日《申报》才发表转自“西字报”的《高乱传疑》。李平书14日寄给冈千仞“《兴亚策》五篇”，应是受“甲申事变”的刺激。李平书和冈千仞都为在中法战争的背景下发生“甲申事变”所震惊。“谓方今策不如付琉球于日本，与之协力以当欧米”，这是冈千仞对李平书《兴亚策》诸篇中最值得重视的观点的归纳，由此引发冈千仞就应对“甲申事变”后中日两国的关系问题与李平书作交流。如前述李平书于2月发表《兴亚策》四篇，至于《兴亚策》（五），因笔者尚未能查见，而不能判断其是否作于得知“甲申事变”的背景下。不过冈千仞所谓“若中土积区区之微嫌，目敝邦为有异图，责以匪衷之语，则东洋之多事源于此，传不言乎铤而趋险不可不戒焉”，似乎是他对李平书就“甲申事变”愤激指责日本言论的回应。若是，则这与《兴亚策》（五）有关。³⁸

19世纪后半期，中日文人的交流中普遍存在这样的两重性，即在挽回西力东渐下传统文化之颓势问题上，双方在有相当多的共识的同时，基于各自国家利益之立场，在两国关系问题以及所谓“兴亚论”问题上，表现了相当激烈的对立。这种两重性在上述冈千仞与上海书院士子的交流中就有不同一般的深刻展现，并留下形象而丰富的文字实录。

中日文化交流在近代逐渐突破双方只能在传统文化情趣方面达到共鸣的狭隘局面过程中，出现了“兴亚论”这样有近代意义的交流主题，这是由当时东亚国际局势所决定的。“兴亚论”源于日本，今天考察这些言论，不是简单地据中国文人当年对“兴亚论”的表态，或他们与日本“兴亚论”者的关系作是非评断。³⁹ 本文的意图只在通过这样的考察了解当时中国文人思想、文化、政治以及精神的状态。

美国汉学家柯文将1850年代活跃于上海的王韬、蒋敦复诸人定名为“在中华世界的边缘活动”的“条约口岸知识分子”。^[5] 在中国近代社会变迁进入1880年代之际，一批出身良好的书院士子在上海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于王韬等第一代“条约口岸知识分子”的文人群体，他们已经在办学、办报、兴办地方公用事业等诸多领域崭露头角，他们在对外交往中也表现出相当大的活力。这都标志着新一代口岸知识分子的形成。自然第二代口岸知识分子仍然象王韬一样身不由己，但也是情不自禁地陷于科举的诱惑，⁴⁰ 也一样地热衷于以上书当道参与政治。⁴¹ 张焕纶、李平书等作为刘熙载、鲍源深这样有地位的名儒的弟子，他们的科途得到各方的呵护，至于他们在地方上的办学、兴办公用事业的活动不但得到父辈们，而且得到地方政府的资助。以书院士子为代表的新一代口岸知识分子在发挥其社会影响方面已经大不同于王韬一代，其结局自然也迥然不同。凭借着深厚的地方社会政治背景，这批书院士子在清末立宪时期成为上海地方自治运动中的精英人物，影响一直延续至民国初年。⁴² 出身及社会地位决定新一代口岸知识分子绝非“在中华世界的边缘活动”，尽管在思想和行动方面更趋新，但在个人品行方面他们则更符合传统社会的要求。⁴³ 总之，他们对近代社会变迁作出了比王韬一代更具正面意义的积极贡献。这种差异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近代社会变迁由边缘阶层向中心阶层逐渐渗透的过程。在探求中国近代社会变迁进程的研究课题中，新一代口岸知识分子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的独立群体，《笔话》及《观光纪游》正是一份考察其思想、文化、政治及精神状况的实录。

（该文刊于《档案与史学》2002年6期。该文资料的收集和研究得到日本财团法人住友财团1995年度“‘亚洲各国与日本相关问题’研究课题资助金”资助，特此说明。）

参考文献:

[1] 冈千仞：支那漫游日记[N]. 邮便报知新闻. 1884-6-20、1884-7-1.

[2] 冈千仞: 观光纪游[M].

[3] 字林沪报. 1884-02-18、1884-02-20、1884-02-22、1884-02-25.

[4] 兴亚策[M] (四).《字林沪报》, 1884-02-25.

[5] 柯文: 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4. 18.

注释:

1. 冈千仞访华期间与人交流, 极少有借助翻译的情况。这不是受条件限制的问题, 当时日本汉学家与中国文人习惯于以笔谈进行交流, 包括冈千仞拜会李鸿章、盛宣怀等政府要员时。

2. (日)《对支回顾录》下卷, 原书房1968年版, 第198页。除这三部访华游记外, 著名的应该还有受日本佛教界派遣访华的小栗栖香顶(1831—1905)在1873年7月—1874年9月游历上海、北京、河南等地, 著有汉文体的《北京纪游》; 作为历史学家的内藤湖南(1866—1934)于1899年夏来华游历, 著有日文体的《支那漫游燕山楚水》。

3. 山本宪(1852—1928)号梅厓, 土佐藩出身, 自少小便习读汉籍, 早在10岁时就已“读毕《左传》、《史记》, 阅读二十一史”。明治三年(1870)废藩置县后才学习“洋学”, 为日本1870—1880年代自由民权运动中的斗士。山本宪1897年秋冬游历中国天津、北京、上海、苏州、南京、汉口等地, 次年刊印《燕山楚水纪游》。关于山本宪及其《燕山楚水纪游》, 参见(日)增田涉《西学东渐与中日文化交流》,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 第230—252页。

4. 所谓“天保老人”指出生于幕末天保年间(1830—1843), 接受了完善的汉文学训练, 在明治时期仍深切留恋汉文学传统的一代人, 其中部分人坚持汉文学写作或汉学研究。与之相对的是出生在幕末长成于维新运动时期的以德富苏峰等为代表的所谓“明治青年”, 他们在幕末直到明治初年接受了系统而良好的汉文学训练, 能从事汉文写作, 但对汉文学不再有太多的留恋甚或有所嘲讽的一代人。

5. 如对中国科举制度及在张焕纶参加科考事上, 冈千仞都有力图予以同情理解的一面。1884年冬张焕纶参加三年一度的岁考, 冈千仞得信后感慨: “经甫实为杰出伟才, 而犹注名禀生, 谈及此事笑曰: 真无谓”。见《观光纪游》第231页。

6. 如郑海麟辑录《清季名流学士遗墨》,《近代中国》第十一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 第276—304页;《盛宣怀与冈千仞笔谈》、《盛宣怀与冈千仞、冈濯笔谈》、《冈千仞致盛宣怀函》, 载《清季外交因应函电资料》香港中文大学1993年版, 第501—517页;《文士来游》, 1884年6月15日《申报》;《日事客谈》, 1884年12月18日《申报》。

7. 藤田茂吉(1852—1892)丰后佐伯藩士, 明治四年入庆应义塾, 八年受聘主事报知新闻社。著有《文明东渐史》一书, 并常有汉文作品载《邮便报知新闻》, 但该篇系日文。藤田本人及《邮便报知新闻》与福泽谕吉关系密切。《大日本人名辞书》(东京)讲谈社昭和四十九年版, 第2251页;《福泽谕吉自传》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第265、266页。

8.《支那漫游日记》与《观光纪游》中相应部分不尽相同, 互有增略。

9. 孙照, 号子明, 1881年间为龙门书院住院生, (见《龙门书院案》, 1881年1月16日《申报》;《书院开课》, 1881年3月17日《申报》) 1884年丰岛舍松留学正蒙书院, 孙照任其官话教师。(《续对支回顾录》昭和十一年版, 第261页) 但不知何故, 冈千仞在《观光纪游》中将孙照名字完全隐去。

10. 姚文枬(1857—1933), 字子让, 光绪八年优贡, 十四年举人。其父姚元兹, 字润生, 咸丰九年举人, 同治年修《上海县志》以“员外郎銜举人”身份分修, 辛未(1871)大挑以知县分浙江, 癸酉(1873)摄富阳, 未几卒。见《上海县志》同治十一年;《上海县续志》民国七年, 卷十六、十八。

11. 葛士潜(1848—1895), “字季源(号子源)”, 诸生, 沉潜好学, 留心世务”, 辑《皇朝经世文续编》百二十卷, 收录张焕纶、姚文枬、姚文枬等人作品。葛氏家族“世以海舶为业”, “贸易积百余年, 复以富称南中”, 至父祖两代因“海舶不利, 家产中落”。其父葛学礼咸丰二年举人; 长兄葛士达(1836—1893)“幼承家学, 两战棘闱不利, 投笔从戎”, 同治初入淮军潘鼎新幕, 光绪年在山西等地任官; 二兄葛士清(1841—1893), 光绪十四年举人。见《上海县续志》卷十八; 葛士达《远志斋稿》;《上海葛氏家谱》民国十七年版。

12. 范本礼(1854?—1894), 字荔泉, “年十五游庠, 入龙门书院, 精研性理并究心经史舆地掌故算术等学。同院张焕纶创正蒙书院, 本礼任教授”。光绪十四年优贡, 寻入江南制造局译书馆, 曾与傅兰雅合译《西国陆军制考略》, 撰《陆战新法》; 邵友廉抚台范本礼随幕。其父范凤藻, 字兰堂, 同治年修《上海县志》以“同知銜选授阜宁县学训导, 附贡生”身份出任监理, 历董敬业、蕊珠、龙门、求志书院, 同仁辅元堂董事, 1884年支持李平书办自来水厂。见《上海县续志》卷十六、十八、二十六;《上海县志》;《李平书七十自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第17页。

13. 张焕纶(1846?—1906), 字经甫, 禀贡生, 肄业龙门书院, 1876年上海道创办求志书院时, “延主讲席”, 任舆地斋长。1878年自主创办正蒙书院, 1885年集资建校舍, 改名梅溪书院。1878年曾纪泽赴任驻外公使, 张氏《上曾侯条陈》, 得“卓然有识, 非浮泛空谈可比”好评, 并因此为郭嵩焘等知。1884年6月张之洞赴任两江总督, 张氏上《救时台言》。邵友廉1882年出任上海道, 张氏深得其赏识, 办学活动多得赞助, 邵氏赴台湾任官张氏随幕。其父张佳梅, 字逊亭, “操豆米业”, 同仁辅元堂董事。光绪年间文人笔记谓“沪上张逊亭先生(佳梅)不事举业, 潇然以诗酒之娱。癸丑之变, 陷城中者凡二百日, 闻见既多,

著为《癸甲新编》，序事详明，足为野史；诗宗初盛唐，不落中晚卑靡之习”。见《上海县续志》卷十八；《曾纪泽日记》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800页；《郭嵩涛日记》（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24页；黄式权《锄经书舍零墨》上海进步书局本，卷三页十。

14. 冈千仞刊行于1882年的明治维新运动史著作，1883年秋姚文栋寄该书到沪，并嘱在报上连载。

15. 姚文栋（1853—1929），字子梁，1881—1887年任驻日公使馆随员，1887—1892年任驻德公使馆随员。曾名列《岁试上海县学一等案》、《龙门书院案》。（见1880年5月4日、1881年1月16日《申报》）翁同龢1896年日记记“上海姚志梁（文栋，年四十五，二品顶带，直隶道员）来见，此人龙门书院高才生；其弟文枬，举人，亦名士也。”见《翁同龢日记》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912页。

16. 杨守敬，字惺悟，时中国驻日公使馆随员，1884年与冈千仞同船回国，随行贩回大量日本刊刻汉籍牟利。

17. 《日本地理兵要》光绪甲申（1884年）总理衙门刻本。于邕（1854—1910），字醴尊，号香草，南汇人。光绪初年张文虎誉于氏家族家学渊源，称于邕作为后继者“英年笃学，潜心注疏，后来之秀当首屈一指”。

（《覆瓿集》，《怀旧杂记》卷一页六）缪荃孙作《于香草墓志铭》称于邕“专力治经，不屑屑为俗学，十六补诸生，登光绪丁酉（1897）拔贡，得直隶州州判，以本生母年高，绝仕进”；后两度“举经济特科，亦不赴”；并誉其《校书记》等著“近时与俞氏（俞樾）评议，孙氏（孙诒让）札遒，卓然为三大师”。（《碑传集三编》卷三十四）从治学趋向而言，向冈千仞介绍于邕者当系姚文枬。

18. 鲍源深，字花潭，安徽歙县人，道光二十七年底吉士，1871年起任山西巡抚，1876年病免后受聘龙门书院，为继刘熙载后的第四任山长。

19. 姚文栋将姚文枬考课文绍介于日本汉学界，且1883年以姚文枬“梅影诗索和”，在东京的中日文人多有和章。（见黄超曾《东瀛游草》）1884年求志书院春季考课，姚文枬名列史学超等，掌故特等；龙门书院七月考课名列超等。（见1884年11月1日、11日《申报》）从《姚文枬集句赠别冈千仞》、《拟汇刊宋人及国朝人补历代史表志序》、《六朝经师宗派并所著经著经说考》等作品以及他在民国时期出任《上海县续志》、《民国上海县志》总纂等事迹，足可见姚文枬为学与致力于经世之学的姚文栋有相当大区别。姚以上作品见《清季名流学士遗墨》，《近代中国》第十一辑，第282—283页；《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五。

20. 冈千仞新作《（订正）尊攘纪事补遗》，书前有黎庶昌署“光绪九年癸未二月”作的《〈尊攘纪事〉序》。

21. 以下为第二次刊《笔话》。

22. 倪鸿，字耘劬，桂林人，为张维屏、黄培芳诸广东著名学者的“高足弟子，博学工吟，——官粤东二十年，——平生爱才好游，踪迹半天下，曾著《桐阴清话》、《风义录》、《退遂斋诗集》等书”；又“曾官苏州”，“辛巳（1881）秋”“入都引见”；时任事轮船招商局，并活跃于《申报》文坛。《桐阴清话》初刻于“咸丰戊午（1858）”年，流传甚广。冈千仞6月6日抵沪当日在王韬处初识倪鸿，谓“曩阅其著《桐阴清话》，故一见神契”；次日倪鸿访冈千仞，冈氏讯问“上海名流”，倪氏答：“胡公寿、杨佩甫、葛隐耕、袁翔甫、钱听伯、葛剑盟、吴鞠潭、黄式权，而王韬为第一流”。见《观光纪游》第19、20页；《题倪耘劬山塘听雨图》，《观光游草》藏名山房藏版；邹弢《三借庐笔谈》上海进步书局本，卷一页十二、卷七页十八；《张文虎日记》上海书店2001年版，第202页。

23. 以下为第三次刊《笔话》。

24. 中村正直是明治时期汉、洋学俱佳，并在日本对外关系问题上持和平主义主张的少有的著名学者。1879年10月1日《申报》全文转载中村正直、重野安绎作《冲绳志》前、后序。中村所作前序对琉球小国之处境有深切同情。此处有关中村的话题应由此而来。

25. 此处《邮便报知新闻》刊印似有误。从与下句笔谈的应对关系来看，“《冲绳志》来此间否？”当系冈千仞的问语。《冲绳志》在1878年前后出版，冈千仞作有《〈冲绳志〉序》，笔谈中所涉桦太（即库页岛）、北海道等的内容，当由冈千仞该序文内容引出。姚文栋1881年作为驻日公使馆随员抵日后，辑录日本有关冲绳问题出版物中的资料，编成《琉球小志》于1883年在上海刊刻。该书未收录冈千仞的《〈冲绳志〉序》，而重野安绎的《〈冲绳志〉后序》被收录，但附有非议该文观点的按语。

26. 李坪书即李钟钰（1854—1927），字平书，光绪十一年优贡。其曾祖“以商船航海起家”，其父李炳铨，诸生。李平书15—16岁时因父亡一度习商，1873年后肄业于龙门书院。1883年蔡尔康主《字林沪报》馆笔政，邀李平书“襄理，日著时事论一篇”，直至1884年秋去职。见《李平书七十自叙》第9、12、13、17、18页。

27. 《观光纪游》第21、26页。二宫景辅（1859—？），宫城县人，出身于实业家家庭，1879年后从事于煤炭业，时旅居上海，与冈千仞有同乡之谊；濯即冈濯，冈千仞侄，陪同其访华。

28. 《观光纪游》第21页。岸田国华（1833—1905），号吟香，幕末受聘于西人平文，与其编《和英辞书》，1866年曾为该书刊印与平文来沪，交往沪上文人，其中有日后中国驻日使节张斯桂。1868年为本藩购轮船再度来沪，1874年日军侵台为随军记者赴台，1877年在东京创设乐善堂，经营自制新药及书籍，1878年来上海开设乐善堂分号。其在华经营书籍包括袖珍本科举用书，1882年以“诗集一百七十余家”请俞樾选编日本首本历代诗全集《东瀛诗选》，1884年刊刻《安南国志》在中国、日本销售。钱恂（？—1883），字子琴，1871年访沪日本人笔下有“清国驻长崎领事钱子琴”说（（日）《对支回顾录》下卷，第77页）。清政府对日派驻近代意义的外交使员始于1878年，当时钱恂驻长崎可能系延续旧中日贸易“宝苏局”驻员长崎的旧制。1875年上海刊印赖山阳《日本外史》，署“钱恂子琴评阅”。明治初期钱恂是为日本人所知较多的中国文人，其中有1872年前后的外务大臣副岛种臣。当时也正是日本知识界对中国，尤其对中国文人的看法渐趋暗淡的时期，岸田吟香关于王韬、钱恂的介绍和评价，以及冈千仞问龙门书院士子关于王韬、倪

鸿的感想都反映了这样的背景。

29.《笔话》应该说没有完全体现笔谈的先后顺序。

30.《观光纪游》第27—28页。该日葛士潜、姚文枬专函邀冈千仞访龙门书院。(见《清季名流学士遗墨》,《近代中国》第十一辑,第282页)刘熙载,字融斋,道光甲辰(1844)进士,官至翰林院、詹事府中允,1866年以广东学政引疾归里,次年受聘为龙门书院山长。

31.《丁祭盛仪》、《记龙门书院》、《甲子冬闾赴金陵书见》,毛祥麟《对山书屋墨余录》同治庚午湖州醉六堂版,卷一、卷二。1881年初龙门书院“奉道宪谕定新章”,甄别肄业生员,李平书、孙照、姚文枬、葛士潜均在册。见《书院开课》,1881年3月17日《申报》。

32.同期上海新建、或恢复的不同层次和功能的传统教育机构还有求志书院、蕊珠书院等。1872年为满足不能入龙门书院肄业者的愿望,上海道沈仲复“自分廉俸,以给诸生膏火”,新设诂经精舍。又,广方言馆1863年创办,至1870年迁新址完成建校,在院肄业生享受伙食费每日一钱,待遇低于龙门书院。除主持书院重建,上海地方政府还推动了从修志到健全以善堂为主体的地方慈善事业体制等一系列的传统活动。

33.《巡道应宝时龙门书院记》,《上海县志》同治十一年刊本,卷九。胡瑗,北宋经学家、教育家,学者称安定先生。其总结出分科教学法,立“经义”和“治事”两斋,讲“明体达用之学”。1876年张焕纶“与二、三同志仿定安分斋遗意以教授诸生”。见《民国上海县志》卷九。

34.应宝时在龙门书院全面恢复师道尊严的旧礼制,如章程第五条:“每月朔望,师长西南面立,诸生以次东北面揖,师长答揖”;其“课规”:“课以经史性理为主,辅以文辞,尤以躬行,入置行事日记、读书日记各一册,每日填记,逢五、十日呈请院长评论,每月十三日院课”。见《春在堂尺牍》卷一,页十八—十九;《上海县志》卷九。

35.盛宣怀、文廷式当在例外。如6月26日冈千仞记在苏州赴名士聚会,席间“每谈日东一事,满座哄然,余不解华语,痴座其旁。因以为我俗席地而坐,食无案桌,寝无卧床,服无衣裳之别,妇人涅齿,带广蔽腰围等皆为外人所诃者。”令冈千仞反感。见《观光纪游》第42页。

36.《兴亚策》(三),1884年2月22日《字林沪报》。中国文人普遍意识到,在当时国势条件下中国已完全无力维持清代前期宗藩关系的规模。冈千仞谓“今也时势一变,虽以百战所并新疆犹且腹削,何有于藩属诸地?前年紫谿东游说此事叹息。”见《观光纪游》第219页。

37.时李平书投资创办自来水厂,在经济危机背景下“是年,交游广,酬应繁”,“岁终经济奇窘”。但也不能排除李氏有意回避会面的可能,因为9月20日冈千仞访《字林沪报》也只见蔡尔康,未见到李平书。见《李平书七十自序》第17—18页;《观光纪游》第119页。

38.李平书晚年自叙:“余素持中日亲善主义,当壬午、癸未之间,尝著《兴亚论》三篇,登诸《字林沪报》。日人冈千仞君来游,引为同志。其时朝鲜事初起,余谓朝鲜为日、俄所必争,中国既不能保,当与日本立约共保之。共保朝鲜,即共拒俄人。……故又著《中日固交以拒俄论》登诸报端,俱为日人赞同。”(《李平书七十自叙》第76—77页)此处所谓“《兴亚论》三篇”,当系误记;至于《观光纪游》所谓“《兴亚策》五篇”,是否即加《中日固交以拒俄论》一篇,尚有待考定。李平书晚年言论有明确社会进化论立场,对外关系则以亲日为立场,1884年前后的真实情况与其自叙有相当距离。1898年李平书在广东遂溪县令任上以强硬立场处理对越法边境争端,深得时誉。

39.如日本汉学者组织“斯文会”所属“斯文赏”塾监丰岛毅之子丰岛舍松,学监重野安绎之子重野绍一郎于1884年、1886年先后入张焕纶门下学习汉学。(《续对支回顾录》第258—259页;《东亚先觉志士传》(中)第234页)1890年6月29日《字林沪报》载姚文枬撰《亚细亚同人会照像记》,介绍柏林的“兴亚会”活动;其后又载《书姚子梁太守亚细亚同人会照像记》。虽然《观光纪游》中无王韬与冈千仞交流“兴亚论”的记录,但有“曾根(俊虎)、品川从松村少将(惇藏)来过”王韬家中的记载,(《观光纪游》第19页)而且该年王韬协助曾根俊虎编《法越交兵记》一书。曾根俊虎是兴亚会的发起人之一。

40.1880年代上海士子仍怀深刻的科举情结,终年应试于龙门、求志等书院举办的各类考课。除张焕纶参加1884年冬松江岁试外,李平书在1884年秋接受业师“仍理举业”劝,辞《字林沪报》,于次年“三月赴郡,补岁欠,应科试考优”,在“七月”南京科考中,以“是科优贡”第五名,继而参加该年秋的乡试。1885年姚文枬也从日本回国,“赴白门秋试”。见《李平书七十自叙》第18—20页;《清季名流学士遗墨》《近代中国》第十一辑,第279、281页;《程耘史上舍书》,姚文枬《东槎杂著》。

41.1884年“马尾兵败”后张焕纶续有“上左、曾二公论时事书”。见《观光纪游》第112页。

42.1905年上海教育研究会会议姚文枬为评议员;1908年姚文枬、姚文枬分别被举为上海地方公益研究会副会长、议员;1909年姚文枬当选上海县咨议局议员;1910年李平书、姚文枬当选上海城地方自治公所议员;1912年李平书出任共和宪政党会长,姚文枬被举为江苏国民公会上海支部会长;姚文枬1912年8月—1913年3月为上海市议会议长;1915年11月姚文枬等致电袁世凯,请“俯顺群情,早正大位”;1916年4月上海绅商因浙江宣布独立,推举姚文枬等四人为代表赴宁见江苏将军冯国璋,请求“维持上海地方治安”。

43.一般而言书院士子趋新,但不叛逆、不颓废。值得指出在社会进化论问题上,虽有时期上的差异,但中国两代口岸文人都与日本“兴亚论”者没有大的区别。李平书晚年言论:“昔之上海何其黯淡,今之上海何其烜赫,吾将问之哲学之士,必曰开化未开化之故。而何以五百年中杳无开化之机,一旦有人焉,……以三十年之经营光耀遍乎寰区,梯航聚于蕞尔。谁为之,孰令致之,吾则曰时也。假使海疆不启衅,则欧洲战舰不集于吴淞,假使牛鑑不败北,则白种之国旗不扬于黄浦。吾尝谓世界有强迫之开化,无自然之开化,理或然欤。”《录邑人李钟钰论上海》,《上海县续志》民国七年,卷三十。

The Records about Communion between Chinese Intelligentsia and Japanese Intelligentsia

-The Conversation by Writing between Intellectuals of Shanghai College and Gangqianren

Yi Huili

(History Depatment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062)

Abstract: China and Japanese share the same culture, so it is easy for the intellectuals of the two countries to understand each other. Even if the languages are different but they can communicate through writing which is recorded in the various materials, especially in the public and private materials. These record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both in research on the Japan-China culture communication and exchanging history and analysis on the thought intellectual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On the basis of the materials about the conversation between Japanese sinologist Gangqianren and intellectuals from Longmen college. The thesis aims at reviewing the thoughts culture political and psychological states of the intellectuals in the ports

Key Words: Gang Qianren; Wangtao ;conversation by writing

收稿日期: 2004-03-15

作者简介: 四川人，女，汉族，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